

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

林万善著

里书局出版

前 记

好事多磨。在研究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中的甘苦，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味。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是利用极零碎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完成的，也是半工半读的心血结晶，前后费了不及两年的时间完成初稿；在研究速度上，已经是尽我最大的能力了！这原是一篇高级学位的论文，在行文上，难免“学术化”了点，但可以向读者告慰的，是写作的真诚与保存史料的信念。

论文是一九七八年一月完成的，完成后，看到方修先生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78年2月出版），发现其中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有非常详尽深入的报导与论析（见该书第三、四、五章）。我在论文里对有关问题虽曾涉及，但十分精简，读者诸君如果有兴趣，还必须对照方修先生的书，才能对有关问题得出合理的结论。

至于郁达夫的离开新加坡，颇具传奇性，在论文里，我不曾详细追究，过后在潘受先生的《海外庐诗》上册卷二（线装，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71）里见到一段诗注，对郁达夫离开新加坡的经过记述得很翔实。这段诗注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达夫自新加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者，约定五日黎明开往邻近之苏门答腊小岛。余告知达夫及李铁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轩待发。达夫所携小行筐，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酒一瓶，牛肉乾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尽之。达夫又言胡愈老等数人尚无以为计，余念与永安两家别购得西行船票，行期为六日，因商

得永安同意，将小电船坐位尽让与之，遂分途。……………

至于冯伊湄（本论文页106），在新加坡期间，据说曾任南华女中的校长，也曾任道南小学的教员，在文教界，作过相当的贡献，这是应该补充一下的。

论文第三章提到的吴天，在六十年代已经去世了。这是最近读到楼满岚写的一篇《不老的赵丹与黄宗英》（《镜报》第15期，1978年10月）才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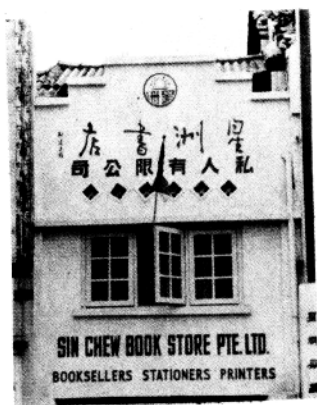
论文初稿写完之后，屡加删增。除了王润华先生之外，方修先生、李向先生、潘受先生曾对本文作一番校阅，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将来有机会，再把全文加以修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郁达夫

郁达夫手迹



郁达夫为星洲书店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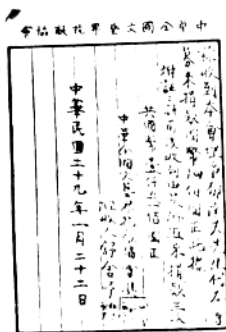
王纪元

胡愈之



洪熹菲

老舍致郁达夫收据（一九四〇年）





王映霞



高云览

郁达夫的儿子郁大雅与女儿郁美兰



右第一人为陈残云



海山街——当年艾芜流浪下榻处



老舍



杜运燮



老舍、杜运燮等留过踪迹的华侨中学



金山



夏衍



金山等演出「塞上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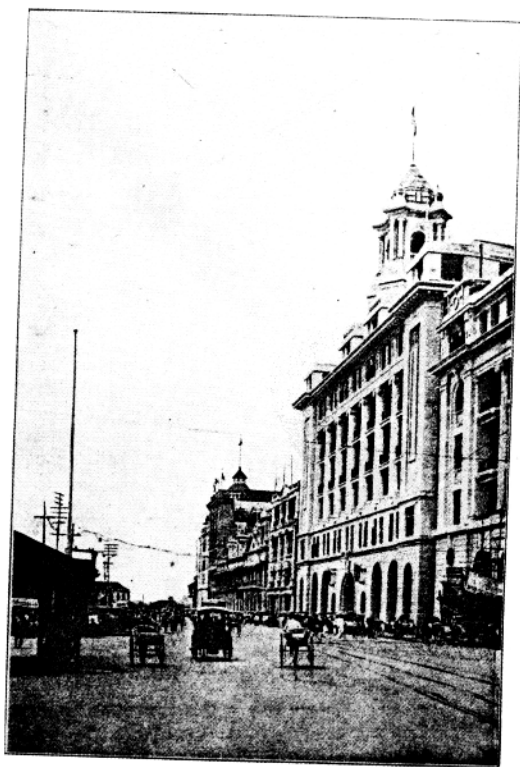
汪金丁



岳野



南天酒楼——当年郁达夫初抵新加坡下榻处



二十年代末期的新加坡哥烈溪乾 (Collyer Quay)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8
一	研究的目的是与方法	1—3
二	研究的对象——“中国作家”的概念	3—7
三	局限于1927——1948年的意义	7—8
第二章	中国作家南来新加坡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9—16
第三章	1927年至1937年中国抗战前南来的中国作家	17—35
一	洪灵菲	17—19
二	老舍	19—22
三	艾芜	22—25
四	吴天	25—34
五	其他	34—35
第四章	1938年底南来的郁达夫	36—61
一	初到新加坡	36—37
二	编务种种	37—43
三	婚变	43—48
四	扶掖青年	48—53
五	抗日救亡活动	53—56
六	在新加坡留下的作品	56—61
第五章	1940年底南来的胡愈之	62—82
一	主持报馆笔政	62—68
二	其他重要活动	68—73
三	在新加坡留下的作品	73—82

第六章	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南来的其他中国作家	83 - 106
一	高云览	83 - 87
二	金山	87 - 89
三	王纪元	90 - 94
四	杨骚	94 - 96
五	王任叔(巴人)	96 - 101
六	沈兹九	102 - 104
七	陈残云及其他	104 - 106
第七章	1945年至1948年南来的中国作家	107 - 115
一	杜运燮	107 - 111
二	夏衍及其他	111 - 115
第八章	中国作家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	116 - 131
一	沟通中、新文艺并鼓舞马华文坛	116 - 118
二	几场论争	118 - 127
三	偏重社会性的文学观	127 - 130
四	结论	130 - 131
第九章	中国作家对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132 - 140
一	筹赈救亡、一呼百应	132 - 135
二	传扬新思想、铜丸走板	135 - 137
三	是作家,也是社会运动家	137 - 139
四	结论	139 - 140
附注		141 - 183
参考书目		184 - 198
后记		199

第一章

引论

一、研究的目与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越来越多。一些汉学家甚至关注中国大陆以外以华文写作的地区的文学发展。近些年来，日本及西方学者都很注意搜集马华文学的资料，进行一些尝试性的研究。¹当然，由于地域及资料流布的限制，由新马地区以外的人来研究新马地区的文艺历史与演进是不很方便的；一来他们对材料不一定收罗得足够，二来他们对材料的真伪及有关的故实不一定熟悉。²为了探究出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一段与中国文学最有关系的历史，我在导师王润华先生的鼓励下，就地取材，选定了一个综合性的论文题目：“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

在这论文里，我所要探究的，是南来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在新加坡的生活、工作，及所写下的与本地有关的文学作品，同时总结出他们对新加坡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想上的影响。这种探讨，是初步性的综合研究，是前人或目前的其他研究者还未真正做过的。正因为是初步性的研究，筚路蓝缕，必须先确定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力求翔实而注重客观的归纳。至于全部的研究，可以预见不免有资料阙失或论述欠周的缺点。这是每一种初步性研究所不可避免的情形，我无须讳言，但愿其他研究者戮力匡正，而自己更应该正步于来兹！

我研究的目的，大致是：

一、从零散的史料里，找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时间限于1927年到1948年）前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有那一些。至于怎样才算“中国作家”，在下一节“研究的对象”里将详细讨论。

三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作家，为什么要迢迢千里地南渡？我必须找出他们南来的外在与内在的原因。当然，本论文不是历史报告，不可能把太多篇幅放在历史的追溯，但中国作家的南来，确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四这些中国作家南来后，似乎都居留不久，短则几个月，长则三五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这论文里，我必须涉及这个彰著的事实，从他们的生活、活动与影响各方面探究出这问题的答案。

五在这些中国作家留驻新加坡期间，对于新加坡当地的文艺活动与文化思想方面，究竟起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一时性的，还是余波荡漾？

六从有关作家在新加坡的生活与活动资料考察，再结合当地文艺发展的起伏消长，不难衡量出中国作家在马华文艺界的地位，也不难比较出他们与当地作者及当地文艺的相互关系。

至于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旧报章里找原始资料，点点滴滴地找出有关的作品或报导、评论，再访问对有关作家有认识或比较熟悉该阶段历史的前辈，获取一些珍贵的口头资料，综合比较，串连排比，从而使研究具体化。由于这是一篇文学研究的论文，我不希望太强调有关历史的问题，也不希望仔细描述若干历史事件。我希望把中国作家在新加坡时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加以突出，使人们了解他们来新加坡后与来新加坡前有些什么异同。我准备发掘出他们在新加坡时作出的贡献，从而分析他们带来的影响。正如威利克 René Wellek 与华伦 Austin Warren 两位教授告诉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莎士比亚？我们主要的兴趣显然不是在于他与其他人相同的那一方面，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任何人；我们也不在于研究他与所有英国人、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所有伊利莎白时代的人、所有诗人、所有戏剧家、或者甚至所有伊利莎白时代的戏剧家的共同点，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将象研究 Dekker 或 Heywood 一样。我们是要发现莎士比亚的独特所在，是什么使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而这无疑地是一个有关个人特质 (Individuality) 与价值 (Value) 的问题。即使是研究一个时期，一个运动，或一个特定的国家文学，研究文学的学生的兴趣是把它们当为具有若干独特形象与性质的个体加以研究，而这些独特的形象与性质使有关个体不同于其他类似

基于上述的出发点，我不能单单平面地铺叙中国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相反的，我必须从研究中，寻找出中国作家与当地作家不同的特质与面貌。

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涉及的对象与范围都比较广泛，如果单单研究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把它们孤立起来，将使这个研究变成偏狭而失去原来的意义。而且，局限于一个人或一篇作品，将没法展示整个文学图景。除了老舍、艾芜等之外，中国作家到新加坡来，仿佛是结伴而来或相继来后联成一气，有共通的工作范围与作风，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前一年最为明显。就这样，他们组成一“代”(generation)。这一代，是不同于往后的任何一代的，而这之后，再也没有中国作家南来了，更不可能组成“代”了。⁴为了探究出这其中的奥妙，我披沙拣金，找出他们南来前与南来后的相互联系，然后尝试解释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吃重的。因为，足资参考的同类材料几乎没有。象郁达夫，历年来都是汉学家研究的热门对象，Anna Doléžalová、Jaroslav Průšek 布鲁克、Gary Melyan 梅其瑞及铃木正夫等都曾写过有关郁达夫的专论，但他们集中研究郁达夫的一生作品或追探郁达夫的死因，对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生活与作品，其实着笔极少，论述极简。至于胡愈之，时至今日，仍没有一篇专门研究他的论文，虽然郑振铎写过一篇《忆愈之》⁵，李立明写过《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⁶，所谈也是胡氏在中国及香港的生活，对他在新加坡的生活只是一笔带过。至于其他作家如王任叔、杨骚、夏衍等在新加坡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人纪录，罕为人知。在“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情况下，我抱了尊重前人、发掘史料的决心，采铜于山，毅然地向前摸索，凝聚概念，扩展思路，开始这项意义深长的研究。

二、研究的对象——“中国作家”的概念

本论文所指的“中国作家”，只限于现代文学的作家，换言之，是五四运动以来从事新文学活动的作家。那些旧文学作家或从事旧文学创作的中国作家，即使曾经来过新加坡，一概不列为研究的对象。不过，这里触及的问

题，是怎样在芸芸的南来的所谓“作家”或所有马华新文学作家里分辨出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了方便论文的论述，我不得不把“中国作家”的概念加以釐清：

一“中国作家”在本论文是不作泛指的，并不是凡从中国来的“作家”都可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如果这样，就战前来说，来自中国的作者群比比皆是。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变成没有界线了。因此，所谓的“中国作家”，必然是对“新马作家”而言，他们的身份是属于中国本土而不属于新马地区。这是从比较得出的概念。

二“中国作家”必须在中国时就已经知名（当然，并不是以出书的多寡来衡量），从事过文学运动。照例的，他们都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列入有关的史料里，不容混淆的。譬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巴人）、杨骚、洪灵菲、老舍、艾芜、夏衍、杜运燮等都是人所共知的道地的中国作家。虽然一些研究者偶然间把他们的一些作品归入马华文学史之中，那其实只是尊重他们在该时期为马华文艺耕耘的成绩，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贸然称他们为“马华作家”。

三原本来新加坡之前是作家，但文名还不彰著，来后继续写作，回中国后则成为全国性作家者如吴天、高云览等，我们也列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毕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作家。至于其他南来的一大批的文化人，可能在报界、教育界、商界服务，间或有所写作，而后也回国，但他们在中国文艺界并不算作家，这些文化人我们就不列为研究对象，如张楚琨等。

四“中国作家”既是中国的作家，倘非意外，当是会从海外回国的。在我们所要论述的研究对象里，除了郁达夫不幸死于苏门答腊（1945年8月）外，其他的中国作家，几乎都回中国。那些来自中国，然后落根新马，不再回返中国而在新马继续文艺事业的如林参天、铁亢（郑卓群）、李润湖（宋千金）、韦晔（上官彥）、刘思、杏影（杨守默）、丘絮絮、以今、柳北岸、李汝琳、范统（王秋田）等等，都只能说是新马华文作家，而不能称为“中国作家”。

五至于那些从新马回中国（不论原本生于新马或生于中国或其他地区）的马华作家，在新马虽然有著作，但回国后便不见再有作品，当然不能算